

走进贾湖遗址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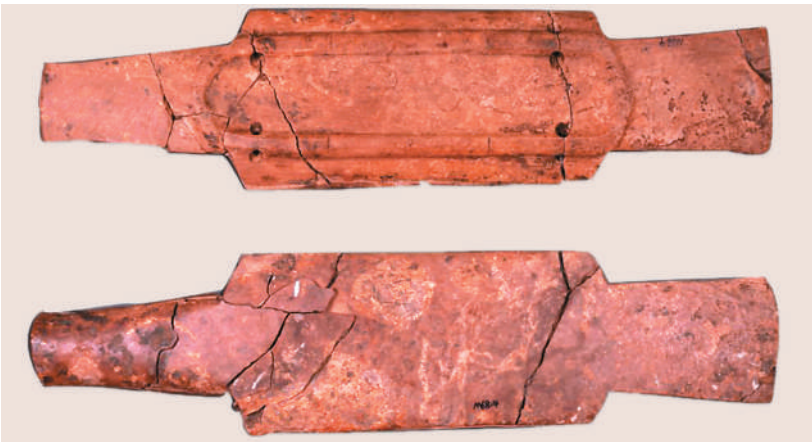
追寻淮上沃土的文明曙光

袁广阔



▲贾湖遗址出土的七孔骨笛。

舞阳县宣传部供图



▲贾湖遗址出土的象牙雕板。

袁广阔供图



▲贾湖遗址博物馆展厅。

舞阳县宣传部供图

站在河南舞阳贾湖村的台地上，脚下是厚重的连续文化堆积层，每一层都有千年积淀。微风掠过芦苇荡，耳畔恍惚有骨笛的清音响起——那是9000年前的贾湖先民，在这片沃土上吹出的第一缕文明之音。

贾湖遗址是距今9000年到75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自上世纪60年代被发现以来，已历经10余次考古发掘，取得诸多重要发现，先后被列入“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和“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依村庄而建的贾湖遗址博物馆，像一座从田野间生长出来的史前聚落。高低错落的单体建筑，由蜿蜒的廊道相连；展厅呈圆形，取法先民建造的圆形半地穴式房屋。

走进博物馆，贾湖文化主题陈列在眼前铺展。石器、陶器、骨笛、炭化稻米、绿松石珠……每一件文物都是一扇窗，透过它们便能看到八九千年前的人间烟火。

农耕渔猎 构建理想家园

农业的起源，被考古学视为文明诞生的基石。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炭化稻米，还有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成套农具，实证八九千年前淮河流域已出现了稻作农业。

与此同时，猪和狗的驯化也已出现。贾湖遗址出土了距今9000年的家猪骨骼，学界认为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家猪。遗址内还发现了有完整狗骨架的埋狗坑，证明狗已经成为人类驯养的家畜。

渔猎采集在贾湖先民的生产生活中仍占有较大比重。遗址中发现了梅花鹿、獐、野兔、丹顶鹤、扬子鳄、青鱼、河蚌等数十种水陆动物遗存，浮选出土了菱角、莲藕、栎果等可食用野生植物遗存。贾湖人不仅使用鱼镖叉鱼、结网捕鱼，甚至已经开始养鱼。

农耕与采集并举，渔猎与养殖共存——多元化的生计模式，为贾湖聚落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食物来源。而农业剩余的出现，又使一些人得以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骨笛制作、绿松石加工等复杂手工业。社会分工的萌芽，正是文明进步的阶梯。

贾湖聚落周围有环壕，面积达6.5万平方米。聚落居住区与墓葬区彼此分离，表现出明显的空间秩序感。房址多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亦有地面建筑与干栏式建筑。

贾湖日常生活用具种类齐全。陶器品类涵盖炊器、储器、盛器、水器、食器等。角把罐、折沿罐、高领罐、敛口罐、圈足罐、鼎、釜、甑，以及双耳壶、缸、盆、钵、碗、盂、杯……器形之多样，表明当时的生活器具已相当丰富。从造型来看，贾湖陶器在实用与审美之间取得了精妙的平衡。许多器物的形体特征历经9000年而未大变，至今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沿用。

贾湖遗址已发现墓葬数百座。其中大墓使用木棺，随葬品丰富，甚至出现了一墓五笛、单座墓葬随葬600枚绿松石的现象。这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木棺，表明作为中国古代礼制重要组成部分的棺槨制度已在此萌芽。

贾湖先民的手工业加工能力让考古学家惊叹。象牙雕板经过切割、雕刻，线条流畅；牛骨叉形器左右两叉对称，表面光滑如脂；绿松石矿石硬度极高，先民们以先切后磨、双面对钻之法，将其制成穿孔串珠。

这些器物的存在意味着：贾湖社会中已有一部分人不必为果腹而终日劳作，他们可以将大量精力投入需要高度专注与世代传承的精细加工。这是社会分工的萌芽，为社会复杂化奠定了基础。

礼乐滥觞 奏响文明初音

如果说聚落、农业、手工业是文明的物质基础，那么礼乐就是文明的“灵魂”。

贾湖遗址最震撼世界的发现，莫过于骨笛。在博物馆的中心展柜，陈列着两支保存完整的骨笛，堪称“镇馆之宝”。

贾湖骨笛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管乐器，以丹顶鹤尺骨制成，有二孔、五孔、六孔、七孔、八孔之分，多数为七孔。经测音研究，七孔骨笛具有完备的七声音阶结构，可吹奏《梁祝》等现代乐曲。此前，学界认为中国的七声音阶出现于先秦时期，而贾湖骨笛的发现将这一历史提前了数千年。它改写了中国音乐史，证明贾湖先民已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骨笛并非孤证。墓葬中，骨笛常与内装石子的龟甲、牛骨叉形器相伴出土。它们不是寻常随葬品，而是沟通天地的祭祀用具。在以血亲与姻亲为纽带的原始社会中，掌握通神权力的族长或巫师受到氏族成员的敬畏，死后享隆重葬仪，以期其灵魂护佑氏族生生不息。这些因祭祀产生的仪式，就是早期礼制的雏形。

贾湖遗址还发现了多处祭祀坑。坑内或埋藏器物，或瘞埋动物，规模不一、形制各异，却共同揭示了一个事实：早期礼制的根基已在淮河畔奠定。

这里还发现了文字的曙光。贾湖遗址出土了刻有符号的龟甲、骨器等，部分刻符与殷墟甲骨文字形相似。这些刻符虽不能确证为成熟文字，但无疑为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线索。

贾湖陶器中检测出酒石酸、稻米淀粉等残留物，表明近9000年前，贾湖先民以稻米、蜂蜜、野果为原料，酿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精饮料之一。而浙江上山遗址的新近发现，又将中国酿酒史的起点提前了近千年。酒，后来成为祭祀仪式中沟通人神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的礼乐文化中流淌数千年。

考古研究 揭示“何以贾湖”

徜徉于展厅中，一个问题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为什么是贾湖？在9000年前的东亚大陆上，并非只有贾湖一处聚落，为何偏偏是这里，涌现出如此密集文明元素？

考古家的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其一，地理生态优势。贾湖位于淮河上游的交流沙河畔，毗邻古湖泊，属于生态交错带。这种地带的物种多样性，是单一河流或平原区域无法比拟的。考古发现的动植物遗存表明，多样化的生态资源为文明的萌发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农业剩余支撑了手工业的发展，手工业繁荣又推动了社会分工的深化——这是一个正向循环，也是文明自我强化的机制。

其二，族外通婚的先进性。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贾湖遗址主要发掘者之一张居中的研究表明，贾湖人已具有族外通婚的萌芽。锶同位素分析揭示，贾湖一期几乎没有外来人口，从二期到三期外来迁入者明显增加。贾湖人可能已经意识到族外通婚的优生之理。

这些综合优势直接体现在贾湖人的体质上——男性平均身高达1.7米以上，少数个体甚至超过1.9米，女性平均身高达1.67米。良好的营养条件既能促进骨骼的生长，也为大脑的充分发育提供保障。或许正是如此，贾湖先民才有足够的体能和脑力去完成骨笛调音、龟甲刻符、绿松石打磨钻孔等一系列精细工作。

裴李岗文化以贾湖遗址等为代表，其早期形态可称为贾湖类型，到裴李岗文化中晚期，已在黄河中下游的嵩山地区初步形成一个文化面貌统一的文化圈。裴李岗文化蓄势中原，通衢八方，影响了周边文化的演进与发展。贾湖类型的先进文化因素，又被后继的仰韶文化、北辛文化和大汶口文化所传承、吸收、改造，最终汇入中华文明的洪流里。

这条脉络清晰可见：从贾湖的稻作农业与礼制萌芽，到裴李岗文化的广泛传播，再到仰韶文化的辉煌绽放——中华文明的根系，在9000年前的淮上沃土中便已深植。

贾湖遗址的发现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是有迹可循、有据可查的真实历史。在9000年前的淮河流域，有一群人用他们的智慧与勤劳，点亮了文明的曙光。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彩陶盆。
杜建坡摄

运城考古成果亮相国博

讲述大河之东文脉流长

本报记者 邹雅婷

运城地处山西省西南部，雄踞黄河东岸，古称为河东地区。这里光照充沛、土地肥沃、水系交织，更有河东盐池和中条山铜矿的宝贵资源，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肇兴”特展日前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该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运城市人民政府、山西省文物局共同主办，以聚落考古视角串联运城地区重要考古发现，精选200余件（套）展品，通过“仰韶之光”“冀州故地”“中条吉金”“周室蕃屏”4个单元，勾勒出自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历史进程。

仰韶文化是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彩陶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永济市晓朝遗址出土的彩陶盆具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特征，为红底黑彩，图案主要由圆点、中间粗两端细的曲线、凹边三角形等几何纹样组成，线条流畅，富有韵律感。

龙山文化时期，晋南地区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先后出现了襄汾陶寺、绛县周家庄等中心聚落。位于中条山和黄河之间的芮城清凉寺遗址，出现了多元文化因素汇聚的现象。

清凉寺墓地出土的三孔石刀，属于三里桥文化遗存，整体呈扁平长方形，刃部不锋利，应为非实用性礼仪器物。它出土时平放于墓主人右腿膝盖下方，刃部向南，同墓还出土了九孔石刀与石钺组合。专家认为，这种奇数多孔石刀，是墓主人身份、权威的象征。

中条山是中原地区重要的铜产地。闻喜千金耙遗址和绛县西吴壁遗址的考古发现说明，夏商时期这里已有铜矿采冶。

绛县西吴壁遗址16号墓出土的商前期青铜爵，束腰环绕一周以兽面为核心的纹饰带，上下为两组弦纹夹实心连珠纹，中部饰兽面纹，釜下素面。有专家认为，这件文物是迄今所知时代最早的兽面纹青铜容器之一，为研究河东地区早期青铜文明发展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周克商后，以王畿为核心分封诸侯，依托宗法礼乐建制，构筑拱卫王室的政治格局。

西周“芮伯作王姊”青铜觚，出土于绛县横水墓地，墓主人为怀姓偃伯，可能是商代“鬼方”后裔。觚内壁近口处铸有铭文，学者据铭文推断，这件器物是周王宗亲芮伯为周王之姐妹嫁偃伯所作的陪嫁礼，印证了周王室与诸侯的联姻。

垣曲县北白鹅墓地出土的东周时期青铜盒体形小巧，纹饰精美，还配有一只青铜勺。研究者对盒内残留物进行检测分析，发现朱砂、植物甾醇、脂肪酸及大量多酚类物质等，推测此盒可能用于装药物或化妆品，为周代贵族女性用品。

从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复杂化的萌芽，到龙山时代早期权力结构的形成，再到夏商时期早期国家的资源控制与管理，乃至两周时期的礼制铸就——此次展览充分展现了运城与中华文明兴起、演进的紧密关系，让观众深入感受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在恭王府赏景泰蓝艺术

李在阳



▲展厅一角。

李在阳摄

麒麟四足踏祥云，昂首张口，身形健硕；白象通体施彩釉，象背配鞍鞯，上驮宝瓶，寓意“太平有象”；仿秦始皇陵铜车马制作的景泰蓝战车，体量庞大、气势雄壮，蓝釉与金彩相映，璀璨夺目……近日，“御器凝辉·盛世重光——北京景泰蓝宫廷艺术特展”在恭王府博物馆开展，近58件（组）景泰蓝作品亮相，展现这一传统工艺的独特魅力。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融铜作、烧釉、绘画、镌刻于一体的传统工艺。这种工艺大约在元代由阿拉伯地区传入中国，明代景泰年间趋于成熟，因器物多以宝石蓝、孔雀蓝为地，故得名“景泰蓝”。元、明、清三代，景泰蓝为宫廷御器。晚清时制作技艺流入民间，景泰蓝制品远销海外，但之后技艺一度濒临失传。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珐琅厂成立，几代匠人接续努力，实现了传统技艺的守正创新。

本次展览以时间为轴，分为“丝路蓝韵 珐琅西来”“宫廷盛彩 珐琅华章”“传承发展 珐琅涅槃”3个单元，展出元、明、清时期代表性景泰蓝器物的复刻作品和当代工艺美术大师的原创作品。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钟连盛介绍，当代景泰蓝制作大体上沿用传统工序，但在材料处理和烧制等方面加以改进，使得釉面更均匀，色彩更丰富。通过拓展应用场景、创新器型设计等方式，让传统工艺走进当代生活，更好地满足今天的审美和社会需求。

本次展览由恭王府博物馆与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将持续至12月6日。展览期间，将陆续推出景泰蓝专题大师讲座与手工技艺体验活动。



▲航拍贾湖遗址博物馆。

舞阳县宣传部供图